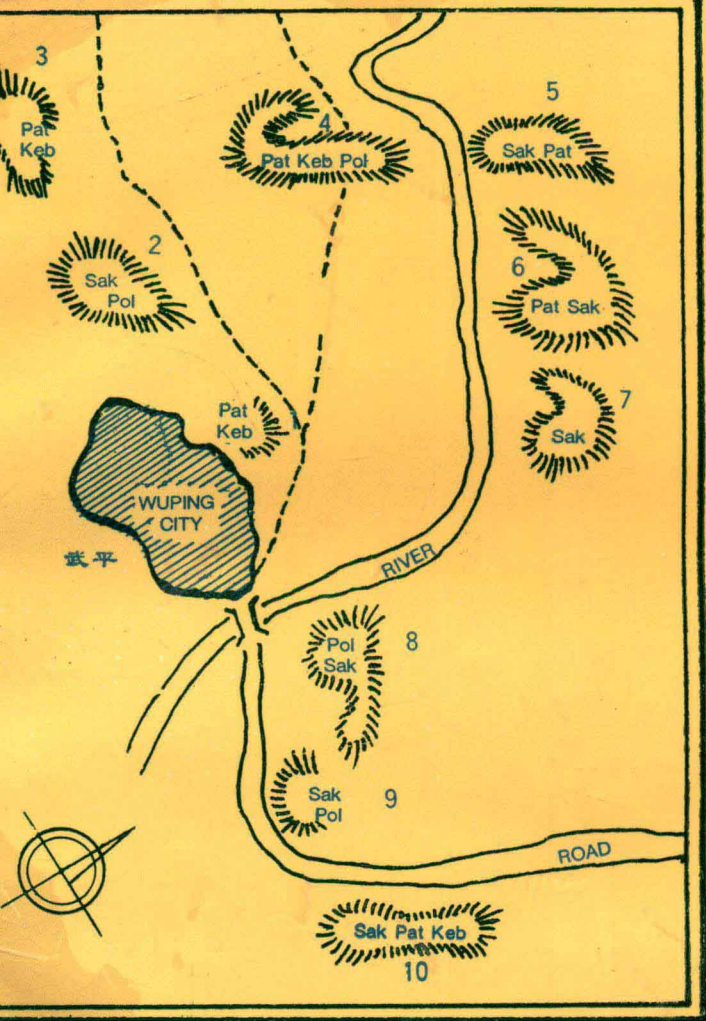


粤东考古发现



[意]麦兆良 著
刘丽君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 东 考 古 发 现

——麦兆良(Fr Rafael Maglioni,
1891—1953)考古专著

刘丽君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东考古发现 (意)麦兆良 著 刘丽君 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2.

ISBN7-81036-043-4/K·4

I. 粤…

II. ① 麦… ② 刘…

III. 考古—广东

IV. K85

(广东省版权局合同登记号:图字 19-1995-005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揭阳新华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3000 册

定价:12.00 元

英文版

粵东考古发现——麦兆良 (Fr Rafael Maglioni, 1891 —
1953) 考古专著

香港考古学会考古研究专刊之二

编辑: 秦维廉 (Willian Meacham)

香港考古学会出版

香港市政局赞助出版

香港九龙邓镜波学校承印

英文版版权属香港考古学会

1975 年 11 月

前 言

热诚而荣幸地欢迎粤东考古先驱者之一麦兆良的考古专著之中译本的出版。

这本翻译作品之问世,有幸使麦兆良的粤东考古专著得以与有兴于华南考古的广大中国考古界学者及业余考古爱好者们见面,无疑是一件令人为之骄傲的快事。

麦兆良的粤东考古专著(英文版)系由香港考古学会于1975年编辑出版,不过该书已绝版多年。香港考古学会欢迎该书的中译本出版问世,并在该书付诸出版的过程中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

我们希望《粤东考古发现》之中译本能广泛发行,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加强华南史前史的讨论和研究。

香港考古学会会长

秦维廉(签字)

1994年2月23日

目 录

绪 言

	麦兆良神父的生平简介	约翰·沃尔登(1)
	麦兆良的考古贡献	秦维廉(6)
第一章	广东省的考古研究	(20)
第二章	最早的居民——沙坑北先民	(47)
第三章	新石器中期文化——海丰三角尾文化	(60)
第四章	新石器晚期文化——菽子园文化	(83)
第五章	菽子园附近的一个大村庄	(95)
第六章	铜石并用的过渡阶段文化	(132)
第七章	全青铜时代:宝楼遗址	(146)
第八章	青铜时代陶瓷的成就	(174)
第九章	史前历史的末期	(200)
附 录	海丰遗址的陶器及石斧分类	(215)
	麦兆神父与广东考古	曾柱昭(226)
译后记		(237)

绪 言

麦兆良神父的生平简介

约翰·沃尔登

1953年考古学家麦兆良* 谢世之前,这部以专著形式结束的考古研究手稿的最后修改润色工作已臻于完成。但他的溘然长逝使得这部考古专著未能如期间世。对于这位孜孜不倦地在华南考古事业中辛勤耕耘的考古学家来说未能亲眼见到他的专著付诸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但是他对华南考古事业的贡献功不可没,这正是我们荣幸地获得这部捐赠的考古专著手稿唯一可告慰籍的理由。在他病逝之前我与麦兆良神父的交往甚密,因而对他的考古著述也最熟谙。当然,谈到关系甚密,我得赶紧补充一点,即当时我与麦兆良神父仅是师生关系这一层面上的密切而已。从那以后22年的光阴过去了,华南史前史的研究工作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正是那些熟悉华南考古研究的人而不是我评价了麦兆良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并确认了麦兆良对那些考古发现所作的阐述与说明。因为,有关麦兆良本人及其考古研究的情况对我来说仅仅是1952年4月我第一次与他晤面到1953年5月27日麦兆良神父故去这之间的一年时间我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

麦兆良 1891年12月4日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翡冷翠地

* 按香港天主教名册录 Maglioni 神父的正式中译应为“麦兆良”,原英文专刊中误为“麦兆汉”,现一并更正。——香港考古学会注。

区。长大后在他所属教区的神学院(堂区修院)完成了学业并于1915年2月27日被授职为神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兆良曾随军服务。战后又在故乡佛罗伦萨当了十多年的神父,之后他加入米兰国外传教协会,且于1928年10月被派往香港转而来到广东海丰区内的汕尾一带传教。海丰地区的汕尾在位于广东沿海香港的东—北—东方向上,与香港相距约70英里。在汕尾传教期间,麦兆良在初步掌握了客家(Hoklo)方言的基础上编辑了一本客家—意大利双语字典,尽管这本字典并未出版过,但据说曾在海丰地区传教的外国神职人员中间广为传用。

麦兆良对华南考古的兴趣始于1934年。那一年麦兆良陪同芬戴礼神父(D·J·Finn, S. J.)在汕尾作考古旅行,有人送给芬神父一块埔上墩出土的陶片。芬神父饶有兴趣地来到埔上墩作实地考察,从而发现那是一个拥有丰富考古遗存的地方,而且认为该地区的考古遗存与他在1932年底以来在香港自然杂志连载的考古论文论及的香港南丫岛的出土遗存颇为相似。据麦神父所说,那次埔上墩之行是他初次协助芬神父进行考古调查工作,此后则是他本人对考古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直至1936年芬神父去世以前,麦兆良都与他保持着较频繁的学术联系,经常用拉丁文写信交流考古方面的信息。

为了实现他本人的夙愿并告慰芬神父的地下之灵,麦打算将他们已发现的25个遗址采集的文物整理出版。截止1938年,麦神父在海丰的考古发现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香港自然杂志1938年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题为《海丰的考古发现》的论文,文中麦兆良对芬戴礼神父开创海丰考古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1938年麦兆良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华南考古的若干发现》的论文,并被收入其后的会议文集中。这是麦兆良在14年间(1936—1952)发表的最后一篇考古论文。1952年他为马尼拉大学的《东亚研究》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大胆建议以他的海丰汕尾所进行的考古研究为基础开展一项华南史前考古的编年史框架研究。这门基础类型学早在1938年以前就已确立,但鉴于麦兆良在1940-1946年间曾于广东、福建两省的内地做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因此他坚持以那些内地考古发现来论证他的结论。不过,麦兆良对他1952年匆忙写就的这篇文章极不满意。

就在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我得悉麦兆良已住进位于幸福山谷内的圣·米歇尔公墓的查普兰牧师公馆,于是我便开始了一周一次地经常性学术访问,以便与麦兆良讨论他的考古研究工作,并探讨麦的海丰考古研究与香港的考古发现之间究竟有何关系。麦兆良的考古研究成果及其潜在价值已得到其上司们的认可,他们充分理解、赞赏和关注他的一切努力,并因此委任他为圣·米歇尔公墓牧师。于是麦兆良便于1952年4月搬进圣·米歇尔公墓的牧师公馆,以便专心致志地从事粤东考古的研究工作。赴港时他随身携带的大量考古文物也一并搬入,其中的大部分是他本人亲自在海丰地区各遗址采集的。

麦兆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在海丰考古的基础上出版一本关于华南史前史的研究专著。在圣·米歇尔公馆居住期间麦兆良专心致志地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多次力劝他在香港进行田野考查的苦心终于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之所以拒绝我的劝告,是因为他已敏感的意识到的,充分而确切地阐述海丰的考古发现,对解决香港诸遗址间的关系以及香港在中国史前考古中的地位等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是一把钥匙。他认识到他本人的使命就是提供这样一把钥匙,而不是再到芬戴礼、史浩菲(Schofield)和其他香港考古学者业已调查过的地方进行重复性的工作。

正是由于麦兆良的这种对既定目标的执着精神,终使我失去了亲眼目睹他在田野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不过,麦曾对我提及他在华南进行考古采集时的一些颇为令人回味的趣事。当时他骑

一辆前面挂着篮子的坤车四处奔跑，这里那里的寻找考古遗存，他采集文物时用的全部工具就是一把螺丝刀和一把小铲。他坦率地承认当时他的形象是多么滑稽，身穿黑色道袍，满腮的黑胡子，头戴一顶黑帽子，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那样子别提有多么显眼了，而且在一个居住着观念保守的农民的村庄里，这简直无法叫人想象出我是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

在麦兆良传教的教区里，人们都很熟识他的身影，因此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进行考古采集，在有些地方，他有时想，夜间出去也许更合适些。令他最为难忘的是，他曾在一个路沟侧壁上发现了一个印有双 F 纹饰的极为精致的球形陶罐。这无疑是他所收集的这类遗存中最精美的一例，也是他最引为自豪的收藏品。这个精美的双 F 纹陶罐的出土地点，确切说，是在汕尾北面一百多英里的五华。这个陶罐只有一小部分的凸面露在外面，在周围挖来挖去却一直看不到边，于是麦兆良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陶罐的露头。最后他终于挖出一个大而完好的精美陶罐。之后，他还把土填了回去才离开。回到住处时天已很黑了，尽管如此，挖到这样一个又大又美、几乎毫无瑕疵的双 F 纹陶罐别提有多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麦兆良对这个独特的陶罐怀有一种爱不释手的迷恋之情，而且他曾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他用一种棕色的鞋油涂抹这个陶罐使之看上去更美观。

本来，麦兆良精心撰写、仔细研究并拟定出版的《华南史前史》手稿在他 1953 年去世前业已完成，但他坚持未收到标本的¹⁴C 年代测定结果前决不付诸出版。当时采集的那些¹⁴C 测定标本已送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地质勘测站 (Lamont Geologic Observat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进行测定。(后来这些标本的测定结果也收进该手稿中。) 麦兆良去世后不久，所有他的藏书、论文、考古发现及文物收藏品已经分类编目，并由赖安神父 (Ryan, S. J.)、D·斯科特女士 (D. Scott)、邓特·金先生 (Mr. Dunt

King)及我本人(John Walden)组成的考古委员会作了评定。1954年麦兆良的全部考古收藏品已由罗马天主教教会捐赠给香港政府。多年来,这些收藏品由香港大学保存,并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专室(后扩为博物馆)存放,尤其在玛丽·特里吉尔小姐任馆长期间,曾为保存麦兆良的考古收藏做了许多工作。1967年3月,麦兆良的收藏品最终全部转交至香港市政博物馆。在麦兆良过世后不久,经天主教主教大人的允许,我曾将麦兆良的考古专著手稿送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保管,后来又交给香港大学的F·S·德雷克(F·S·Drake)教授保存,当时的打算是希望香港大学的国语系能将它付诸出版。

麦兆良的考古贡献

秦维廉

实际说来,完全是一些偶然的机缘使得麦兆良神父花费了半生的心血从事考古研究并因此成为研究华南史前史的先驱者之一。恰如麦兆良在本书的开头处所说,他在 1934 年初次于汕尾陪同芬戴礼神父从事田野考古调查时引发了对考古研究的极大热情,当时是芬戴礼神父的一个学生告诉芬神父在汕尾地区有一个考古遗址值得一看。说也凑巧,汕尾南部的捷胜半岛(the Tsiap-tseng peninsula south of Swabue)恰好是麦兆良传教的教区,那是华南沿海一带拥有最为丰富的考古遗存的地区之一。麦兆良的田野考古调查仅两年内就发现了 20 余处重要的考古遗址,采集了几百件完好的石器和陶器遗存,还有几千磅重的文物资料,其中大部分是碎陶片。首先,不仅仅是麦兆良发现并记录了这些遗址的考古遗存,同时也是大自然本身的风化侵蚀作用使这些遗址轻而易举地就被挖掘发现。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工制品的石、陶碎片仍处于原始位置,但其泥土保护层却因若干世纪的风雨冲刷而流失。毫无疑问,大量的考古遗存在麦兆良发现这些遗址前就遗失了。不过从遗址的情况看来,其风化侵蚀的过程是离现在较近的时期开始的,遗址上面覆盖的植被已破坏殆尽,而且形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然而,麦兆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现大量的机遇,这使他更加专注地在海丰地区进行华南史前文物的采集与研究。1940-1946 年间麦的考古勘探研究已扩展到粤东的大部分地区。最后,麦兆良于 1946 年来到香港,把他的余生之年完全奉献给考古收藏品的研究以及对华南地区的史前史的著述与研究。麦兆良神

父对考古学的重大贡献主要包括田野考查和研究、考古收藏及著述。所有这些保存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资料将在下文介绍,其中包括他的考古出版物——主要是已发表的考古论文、手稿、笔录,还有文物收藏品等。

麦兆良的考古著述

麦兆良神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及其手稿、笔录无不表现出他所具有的两方面的个性特点:其一是善于认真记录事实和仔细标示数据,这是严格考证、一丝不苟的考古学者之风度;其二是善于以手头资料引发联想并精心重构稍纵即逝的思绪,这是极富想象力的理论家之风格。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倾向在他 1938 年和 1940 年撰写的两篇重要论文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他 1938 年的那篇阐述海丰考古发现的详尽报告就是以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本素材写就的,从而使之具有永久性的参考价值。再则,麦兆良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术会议上宣读的另一篇研究报告中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同时对那些实际上未经证实的关系提出了最大胆的假设。例如,在论及苏美尔人文明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沙坑文化)”的关系以及史前陶器的纹饰和汉文字的早期字形关系等问题时,麦兆良就提出了大胆的假设。他的许多理论设想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不过现在大部分业已过时,如麦兆良认为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即是当时遍布世界的雅利安人文明的最早开拓者,而且惠及中国文化。……这一结论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两个相反相成的特点在麦兆良的思维中绝不是孤立脱节的。相反,对一些考古资料的正确阐释往往从二者的结合中脱颖而出。这种思维方法的正确性不仅由他本人出色的文化编年序列所证实,而且大部分为今天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所证明。麦兆良关于各种石、陶器的祖型及其演化发展与用途的探讨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他的考古研究结论。但是,另一方面,麦兆良曾想把

民族史(ethon - history)研究建立在诸多文化丛的研究基础上,这一设想或尝试却注定要失败[正如海因 - 格尔顿(Heine - Geldern)的人种史的命运一样。海因 - 格尔顿的“圆镞人”(round - adze people)、“阶镞人”(stepped - adze people)等诸如此类的人种史研究方案曾是 20 世纪 30 年代诸多考古学家仿效的模式]。

麦兆良在其生前的最后 4 年所写的考古研究手稿洋洋 20 万字左右。不出所料,他的这本专著也反映出其早期著述的写作风格和方法,所不同的是想象的成份更多些。显然,这种情况增加了手稿本身的篇幅,这就需要以文集的形式出版。当然要将大量材料和既有趣又未过时的阐释全部发表出来,没有一个一卷式全集版本看来是不行的,这一点从麦兆良手稿的谋篇布局中也可可见端倪。因此,这本全集将包括各类遗址的材料,并按手稿的篇章结构铺陈其内容。例如,在第一章中应概要介绍海丰地区的地理情况。现在的第一章像是全书内容的概述,囊括了业已发表过的论文、田野考查记录、考古日记、备忘录(已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甚至包括书信资料等各方面有关内容。不过,麦兆良在援引其考古资料时是有选择的,例如他在 1938 年的一篇论文中将沙坑文化典型遗址所在地区(Son area)描述为一个“由简陋房屋围成的半圆形小村”,但是在麦兆良的文集手稿中却未见如是提法。不过,麦兆良在其田野记录中谈到他曾在一个村庄的方圆一公里的范围里看到俯拾皆是的陶片。后来麦兆良在给芬神父的拉丁文备忘录中提到各类遗址的土壤问题时,认为海丰沙坑北一带的土质不同于沿海其他遗址的土壤,前者是红褐色的沙土,而后者是洁净的滩沙。

麦兆良在其田野笔录中曾详细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层的东坑中遗址(Tam),但在麦兆良的专著手稿中这一实例却只是一笔带过而已。麦兆良还积累了成百上千条这样的例证,这些翔实的资料是作为原始材料记录的,因而未曾收入该文集手稿中。这些原始笔录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一本长达 66 页的手记。1952 年,

麦兆良在写给哈伦姆·莫维厄斯教授(Hallam Movius)的信中谈及这一抄本中的精华部分,并详述了其原始材料的来龙去脉以及需做¹⁴C标本测定的考古遗存问题。

在谈到出版手稿的选材和编辑原则时,麦兆良认为,考古学的目的在于反映人类生存的轨迹。因此,他在其手稿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那些田野资料包容进去,那是他辛辛苦苦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其次再尽可能地写进他对遗址出土文物及其文化内涵的最新阐释,并相应地减少过分的想象和推理的描述。麦兆良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即试图采用芬戴礼回忆录文本的风格,以确立海丰和与其遥遥相距的满洲里(Manchuria)、华北(North China)及东南亚(Southeast Asia)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去这些史前文化大都被忽略,其中大都含有汉字语源学的研究内容。此外,麦兆良关于民族史的若干推论也多半由现已从考古学中删去的例证演绎而来,然而,这种写作风格业已过时。

麦兆良曾就民族史写过这样一段话:“三角尾人,由于是不同民族的先民,且操不同的语言,因而受到较强悍的菝子园先民的冷遇,只好被迫定居于山丘旁和其他一些穷乡僻壤之地,所以其后不久又再次迁徙。”“也许有这样的可能性,菝子园先民愿娶三角尾地区的姑娘为妻已形成普遍的习俗。”

麦兆良考古专著的手稿中附有大量插图,有的已在他发表过的主要论文中出现过,还有一些则是根据他所画的草图重新绘制的。现在又加进一些文物照片。令人颇感遗憾的是麦兆良留下的收藏品中几乎见不到田野遗址的照片,而且根本见不到遗址现场出土文物的任何附图,究其原因何在,却不得而知,也许已经遗失,也许压根儿未曾有过。不过在麦兆良的遗物中发现有几百张教会生活照及民间习俗、自然景物的照片和他在东坑南遗址现场画的草图。在麦兆良的考古笔记中还有两张标有遗址地点的简略地图。其中一张标有海丰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等遗址的地图已

拼入海丰遗址总图中。第二张地图是为了配合各遗址的说明,遗址的位置是他在 1938 年的论文中采用的沿海略图中标定的。现在集中的这张图则是该地区的地形测绘详图。

麦兆良的文物收藏

麦兆良于 1936 - 1946 年间在华南地区所作的大量考古调查、文物收集及史前研究工作,较之于华南地区其他任何考古学家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他采集的文物大部分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惊人发现。而且文物采集的数量之多也实为罕见。仅在海丰一带的遗址中采集的陶片就有 1800 磅重,石铤 400 多件,占其华南考古发现的一小半。在他的全部文物收藏中竟有几百件石铤和 26 个完好无损的陶钵,这足以证明麦兆良在粤东内陆地区的田野勘查工作是何等出色。诚然,麦兆良不是一个猎奇者,而是一个严肃的考古学者。因此与其他收藏家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材料和数据的积累。

但是麦兆良的文物收藏几经迁徙而渐有减少。在从事考古研究之初,他就常常责备自己没有妥善保管那些初始发现的遗存(曾遗失菰子园文化时期的几个铁矛头),这使他认识到有必要将所发现的文物遗存进行登记、编目和文字说明以便保存。正是基于这种周密的考虑,我们今天才会拥有几经周折而幸存下来的粤东考古文物收藏品。

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使这些出土文物或遗存遭受到接二连三的破坏。麦兆良在其考古笔记中提到,一次灾难性的台风使位于汕尾的教堂毁于一旦,许多文物遗存因而遗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扰使他成为战争的受罪羊。他在写给莫维厄斯的一封信中说,战争爆发时保存在汕尾教堂的大部分史前文物遗失殆尽,好在保存于香港的一些文物精品至今仍安然无恙。1942 年,广州孙逸仙(中山)大学教授杨成志博士到汕尾访问麦兆良,并到海丰遗址

进行实地考察,还查看了麦兆良的文物收藏,然后要求麦兆良将其考古遗存捐赠给中山大学。杨教授的助手挑选了8箱文物,说其余的文物留交中国政府保存。关于杨教授的这次访问,麦兆良曾有这样的记载:

“一天他(杨成志教授)来到我这里(San Giuseppe)要求我把自己的考古文物捐赠给中山大学。于是他的助手便挑选了一番,拿走了8箱文物,还说要我把剩余的部分留交中国政府保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查抄)自然,这种情况使我颇为不满,但一种自我安慰的念头强压住了我的怒火,权且认为,在战乱期间那些考古文物保存在广州也许更安全些,而且,也许,(上帝保佑)战争结束后我会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有权自由地进行华南考古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些文物资料不要丢失才好。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尚可差强人意。”

然而遗憾的是那些文物还是遗失了。不过当时麦兆良已决定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物送到香港保存起来。说到底这些保存在香港的文物在麦兆良现存的考古收藏中只是占很小部分,而且都是海丰出土的考古遗存。幸好一些用于 ^{14}C 测定的标本及需要测定年代的木炭、动物骨头、贝壳等出土遗存都在当时封装好后送往香港保存。麦兆良在武平县一带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年代。尽管是战乱时期麦兆良在武平县仍能进行经常性的考古活动并重又采集了大量的文物。1946年麦兆良带着所采集的文物返回香港,后来在他定期到其他地区考查访问期间,又采集了一些文物遗存。1953年麦兆良过世后,他的全部文物收藏品均由罗马天主教会捐赠给香港政府,并保存在冯平山博物馆(Fung Ping Shan Museum)。1969年麦兆良的这些考古收藏品又转至香港市政博物馆保存,1975年则迁入九龙(Kowloon)的新历史博物馆。

现在看来,麦兆良的大部分文物收藏中有的没写标签(数量有几箱),有的只标明菽子园文化和三角尾文化等字样。约有5—